

邓林 著



中央文献出版社  
大家出版社

我的父亲  
*Wo De Fuqin Deng Xiaoping*

邓小平

图文版

我的父亲

Wo De Fuqin Deng Xiaoping

邓小平

图文版

邓林 / 著 【下卷】

中央文献出版社

 大象出版社

# 目 录

我爱我的父亲 \_\_\_\_\_ 5

爸爸 \_\_\_\_\_ 31

爸爸和妈妈 \_\_\_\_\_ 72

爸爸和我们 \_\_\_\_\_ 80

爸爸和我 \_\_\_\_\_ 141

后记 \_\_\_\_\_ 149

我的父亲

Wo De Fuqin Deng Xiaoping

邓小平

图文版

邓林 / 著 【下卷】

中央文献出版社

 大象出版社





我的父亲

邓小平

Wo De Fuqin Deng Xiaoping

# 目 录

我爱我的父亲 \_\_\_\_\_ 5

爸爸 \_\_\_\_\_ 31

爸爸和妈妈 \_\_\_\_\_ 72

爸爸和我们 \_\_\_\_\_ 80

爸爸和我 \_\_\_\_\_ 141

后记 \_\_\_\_\_ 149

# 我爱我的父亲

郑小平

1997年2月19日——爸爸走了，那么从容、平静、安详。

他是含着微笑远去了……

这一年，爸爸九十三岁。

日转星移，岁月如梭。

每当我走进我们家的院子，不禁思绪万千。算起来，爸爸在这里生活了整整二十年。爸爸是非常钟爱我们家的这个院子的。他每天都要在院子里散步。这里的每一棵花、草、树木都已经成为他的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，跟随着他的脚步，一天天长大，一年年成熟。当年那几棵石榴树，如今已高过房顶。到了秋天，果实累累，压弯了枝头，火红的石榴绽开裂口，露出一颗颗石榴籽，红白相间，像宝石般晶莹剔透。核桃、柿子、海棠、葡萄熟了的时候，引得小鸟、鸽子、灰喜鹊常来光顾。三棵雪松已经长得遮天蔽日。还有几棵白皮松英姿华贵，伸向蓝天。那两棵油松，长得拙朴、苍健。一棵高，另一棵稍矮，枝叶互相拥抱着，并肩矗立，好像是我们的爸爸和妈妈相依相伴。我们就给它们起了个名字叫“双龙树”，因为我们爸爸和妈妈都属大龙。到了隆冬时节，万木已经凋零，我家院子里却还是绿色常新，松青依旧。

如今，每一天，当太阳升起的时候，我仿佛依然能听见爸爸在院子里散步的脚步声；走过他的办公室，我好象又看见爸爸还坐在他那张套着土黄色布套的旧沙发上，静静地读报，专心地批阅文件；我似乎还听见，孙子们在爸爸的身旁叽叽喳喳，欢声笑语……家里一切都显得平静如常，好象爸爸并不曾远行。

每一天，当我走在大街上，看见车水马龙、熙熙攘攘，人们匆忙的脚步、街市日新月异的面貌，显示着活力和勃勃生机。正如爸爸生前所



“双龙树”

期望的那样，人民在满怀希望地辛勤工作，我们的祖国正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继续前进。

而在我心里，总是觉得爸爸并没有走，他和我们在一起，他还生活在我们中间，慈爱地、带着欣慰的神情在注视着我们。

我想念我的父亲，这种思念之情与日俱增。

(一)

我是家中的长女，1941年9月11日出生在太行山。

我的降生，本应会得到父母加倍的疼爱。可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，正在对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疯狂扫荡，根据地进入了最艰苦的境地。军情紧急，爸爸无法带着我率兵打仗，刚刚出生七天的我，就被托付给一个非常贫苦的农民家抚养。两年以后，当我被接回到父母身边，已经奄奄一息，极度的营养不良，多种不知名目的疾病，使我衰弱得连赶苍蝇的力气都没有了。父母心疼之至，却不得不把我又送进了延安保育院，因为爸爸还在打仗。我身体太弱，常常不能和其他的孩子一同到外面去玩耍。一天，刚刚两岁的我被独自留在房间里，突然，我的棉袄袖子被炭火烤着了，我拼命大哭。终于被一个小战士听到，救了我，否则我可能就被烧死了。直到现在，我的胳膊上还有一个很大的烧伤的疤痕。妈妈常常对人说：“邓林小时候真是受了不少的苦。”

爸爸是个性格内向的人，很少用语言表达感情。解放战争胜利后，从上海到四川，再到北京，爸爸千方百计为我寻医治病。我的病情比较复杂，特别是嘴里长了瘤子，开过刀，又长出新的瘤。爸爸下了大决心，费了许多周折，使我得到当时那种条件下最好的治疗。此后，我的体质虽然仍不能和我的同龄人相比，但我却也能以基本正常的体魄面对生活，建立家庭，承担责任，做出成绩。我知道，这一切是爸爸、妈妈给予我的。

全国解放后不久，爸爸调到中央工作，我们家搬进了中南海。那时候，我们已经有了五个姊妹兄弟。爸爸、妈妈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，对我们从不娇惯。小学，我们三个大孩子上寄宿学校，每星期自己坐公共汽车往返于远在郊区的学校和中南海的家。上中学大家都骑自行车。



全家福，1955年8月。

爸爸每学期期末都要看我们的记分册，每个孩子的情况他都了解，优点、缺点、性格特长，他心中有数。但是具体的事情，他一概不管，放手让妈妈教育我们。爸爸信任妈妈，相信她带出来的孩子都是好的。他们两个，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非常和谐、默契。所以，我们家的孩子都比较正直，善良，质朴无华，也都能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，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。

妈妈曾经说过：“你们五个都已成才，都有自己的谋生手段，你们在工作岗位上都能够兢兢业业，力所能及做出成绩来，妈妈高兴，爸爸也高兴！”我们可以自慰，我们没有让爸爸、妈妈失望。

我的妈妈是云南省历史上第一个考入北京大学的学生。投身抗日，到了延安，1938年和爸爸结婚。妈妈是个好人，朴实，诚恳，大方，与爸爸相濡以沫、共苦同甘。妈妈心地善良，为人又厚道，又宽容，而且特别能干。想当年，我们家五个孩子的毛衣、毛裤等，都是妈妈一手织成的，织得又快又好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被关押的时候，妈妈为爸爸精心织补了一件开司米的毛衣。袖子上原来破了一个大窟窿，被妈妈修补过后，完好如初。

爸爸、妈妈希望我们都能成为有知识、有文化、对国家有用的人才。小时候，每个星期天，妈妈都会为我们安排一些有趣的活动，参观啦、郊游啦、看电影啦……妈妈带我们一起浇花、种菜，教我们女孩子打毛衣，培养我们的劳动观点和自理能力。爸爸喜欢打桥牌，妈妈就自己先找人请教，她学会了以后再教我们。我们五个姊妹兄弟都学打桥牌，只是大胖子朴方和楠楠打得最好，多年来一直是爸爸的好搭档。妈妈自己也经常给我们讲科学知识。关于核裂变的原理，就是我上小学的时候听妈妈讲的。我的弟弟、妹妹有三个考进了北京大学物理系，大概也是受了妈妈的影响。

我的身体多病，学习有些困难，曾几度休学。妈妈鼓励我说：“要发愤图强。”爸爸说：“不是发‘愤’，你不是跟谁生气。你应该奋发图强，自己振奋起来，争取好的成绩。”爸爸的话给了我信心和力量，成为我多年来争取进步与成功的动力。妈妈为了我的学业费了许多心思，最后给我请了一位中国画老师，让我学习画中国画，既能适应我的身体条件，又



爸爸和妈妈在太行山，1938年8月。

能充分发挥我的特长。今天我能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，成为一个画家，我十分感谢妈妈为我所作的选择和安排。

现在想起来，我们的青少年时代是多么幸福、美好！我们无忧无虑，我们快快乐乐，我们学习都非常努力。几个弟弟、妹妹在学校都是优秀学生，还当学生干部。回到家里，我们感到温暖，充实。说句实话，那时候，对于父亲的了解真是太少，太少。他的职位有多高，他的权力有多大，我们都不大清楚，也不太关心。只知道爸爸是党的下部，为党工作是他的天职。因此我们必须更加严格要求自己。

我们都爱我们的父亲，我们都爱我们这个家。

但是后来，我们没有家了。那个疯狂的年月打碎了一切。

1966年6月，一场风暴无情地摧残着整个中国大地，一切尊严、秩序都被扫荡殆尽。法律、信念、道德、感情被撕扯得支离破碎。正直的，无所适从；疯狂的，随心所欲。中国正在向何处走去？！

当时，我的父亲还正在他自己的岗位上。他曾期望能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，阻挡那些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，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。

但是没过多久，我的爸爸被宣布为“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，要求“全党共诛之，全国共讨之”。爸爸被彻底打倒了。

我们的爸爸，那个曾经出生入死、驰骋疆场、屡建战功的爸爸；那个兢兢业业、日理万机、受人尊敬的爸爸——他和我们的妈妈并排站在院子中间，被人群围着。人们吼叫着，挥舞着拳头，凶狠地强迫爸爸、妈妈低头、弯腰……我们几个孩子被惊呆了，心里害怕极了！

我回到学校。学校早已经没有课上了。到处口号声震天，大字报铺天盖地。熟悉的面孔突然变得冷若冰霜。呵斥、批斗、谩骂、吐口水……我觉得我们全家像是被一阵恶风浊浪抛向了无底的深渊，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也不知道明天将会怎样……

“好心人”跑来劝我说：“赶快和你爸爸划清界限，揭发他的问题吧！”我哭了。我真的不知道我的爸爸究竟犯了什么错误？我更不明白，我和我年幼的弟弟、妹妹们究竟做错了什么？

运动刚刚开始不久，我曾经问过爸爸：“我们该怎么办？”

爸爸回答说：“你们自己考虑。”

命运逼迫我们去了解父亲，认识父亲。我们必须独立思考，不能有任何依赖、幻想。

我和两个妹妹骑自行车，跑到中组部、中宣部、统战部等机关去看大字报，想看看爸爸到底有什么问题。结果只看到“白猫黑猫”等几条所谓的“罪状”。

爸爸没有问题。我们自己这样认为。

但眼前发生的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？

还容不得想，我们全家就陷入了愈加艰难的境地。

爸爸和妈妈失去了自由。全家人都不能、也不敢和他们说话，如果被人听到，说我们通风报信，说我们串供，他们的处境就更难了。

美术学院宣布不许我回家，还要我参加批斗大会，揭发、批判我的爸爸。我因为内分泌失调，多年来患有嗜睡症。有一次开批判会，会场上高喊着“打倒邓小平！”的口号，可我居然睡着了。事后，我因此而遭受批判。

朴方和楠楠在北京大学遭受围攻、逼供。他们说朴方是“小邓小平”，对他进行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，取消他的预备党员资格……最终酿成终身残疾的悲剧。这是我们全家最伤心的事。妈妈为此哭伤了眼睛。

爸爸被打倒之后，我被关进“牛棚”之前很长一段时间，没有人敢理我，也不许我回家。我天天想家。不知道爸爸、妈妈、奶奶怎么样了？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看见他们了。有一天，我请假上街去买日用品。出了美术学院的大门，我突然想到家，我要回家去看看爸爸，见见我的亲人们。心里这样想，脚底下走得飞快，直向着中南海里那个我日夜思念的家。

我从后院的小门溜进了家。爸爸、妈妈、奶奶都在，弟弟、妹妹们都不在。爸爸沉默，妈妈显得疲惫，有些憔悴，奶奶还是老样子。看见我回来，他们露出了笑容。我心里非常激动。我已经记不得当时我都说了什么，听了什么。或许就是我谈谈我的情况，听听他们的情况，弟弟、妹妹们的情况……这在当时对于我们是多么重要、多么珍贵、多么迫切想要知道的消息！然而，对于我，更重要的，是我的胜利。我回到了家，



我在河北省宣化劳动，1969年。



我在河北省宣化造纸厂当工人，1969年。

见到了我的爸爸、妈妈。这是我第一次在逆境之中经过斗争，运用自己的智慧，争取到的应得的权利。

挫折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。其中一大收获就是学会了搬家，打包，捆行李。在那动荡的年代里，我们被到处驱赶。子女的聚、散、归、离暂且不算，就是以爸爸、妈妈为中心的我们的大家，十年之间，一共搬过七次。除去江西那三年，我们几乎每年都得搬一二次家。

1967年9月，我还被关在美术学院里。一天，突然通知我赶快回家。回去一看才知道：限令我们五个孩子和奶奶两个小时搬出中南海。两个小时！天哪！那可是那么大一个家呀！不容迟疑，不许争辩，不能抗拒。我们闭着嘴，用最快的速度把可以带走的生活必需品打包，装车，离开了中南海。

爸爸和妈妈被留在中南海，单独隔离起来。

分离的时刻，我们不能叫一声爸爸、妈妈，不能和他们说一句话。看着爸爸、妈妈凄凉、无助的身影，心里难过极了！我有多少话想对他们说，哪怕只说一声：“爸爸、妈妈多多保重！”可我什么都不能说，连哭都不能哭。我强忍着不让泪水掉下，扭过身去，不敢再看那别离的场面。

我们五个子女和奶奶一起，被送到方壶斋的两间小屋暂住。没有爸爸、妈妈在，我第一次意识到，我们没有家了。

1969年，我已经随美术学院的同学一起被送到河北宣化部队农场，接受再教育。我在那里当过造纸厂的粗筛工，当过酱油厂的洗刷工。更多的时间我是和大家一起“修理地球”，翻地、种水稻、挠秧、拔草，什么活都干。

10月，林彪一号通令下达。连里突然通知我马上回北京去。

“找谁去呀？”我问。他们也说不清。

“你就找中办去吧！”连长说。

归心似箭。我下了火车，直奔中南海。心里七上八下，忐忑不安，不知出了什么事情。西门的警卫说：“回家去吧！”我三步并作两步地跑。推门一看，几个月不见，爸爸、妈妈和奶奶显得苍老了许多。难以想象，那被监禁的日日夜夜，他们是怎么度过的？更让我难过的是，爸爸、妈妈和奶奶马上就要被押送到江西监督劳动，两天之内动身。叫我回来是

让我帮他们打行李。那时候，毛毛和飞飞早已分别下到陕西、山西的农村插队；朴方正躺在医院里；楠楠也已经跟随北京大学的学生去陕西汉中劳动。他们都不可能回来。只有我独自面对这三位即将远行的年迈的亲人。

我哭了。妈妈和奶奶都哭了。

爸爸依旧沉默着。

10月22号，一个难忘的日子。我陪着三位老人坐在一辆吉普车上。汽车呼啸着驶出了中南海。天空阴沉沉的，路程好象很远，很远，走了很长的时间，才到了一个远郊的机场。

一路上我们都没有说话。我们都不想说话。因为我们都无话可说。又要分手了。生离死别！伤痛和凄凉压满我的胸膛。

飞机消失在灰蒙蒙的天空中，不知道我们未来的命运将会怎样？

江西是个美丽的地方。青山常绿，碧水长流。

江西对我父亲来说，却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地方。在他漫长的革命生涯中，两次最痛苦的磨难都是在江西度过的。第一次是在1933年。当时，毛泽东遭受王明“左”倾错误路线的排斥。爸爸因为支持毛泽东的路线，被撤销了职务，受到党内处分，强迫劳动。他的家庭又在此时发生了离异。沉重的打击改变了爸爸的性格。他从一个开朗、活泼、谈笑风生的青年，变成一个沉默寡言、不苟言笑、却又是刚毅果断、坚韧不拔的人。那一年，爸爸二十九岁。

三十六年过去，爸爸已经是六十五岁的老人了。再进江西，是第二次被打倒，专机押送，监督劳动，一住就是三年多。上午爸爸、妈妈步行去工厂做工，下午读书、学习，和奶奶一起劈柴、拖地、喂鸡、做饭、洗衣……繁忙辛苦。不许和人交谈，不许与人交往，不许走出院门。三位老人相依为命，孤独冷清。我想，爸爸的内心是很痛苦的。国家的前途不可知，事态的发展不可知，个人的命运不可知。他在苦苦地思索，静静地等待。我知道，爸爸是非常爱我们的。他给中央写信，要求允许子女探亲；要求让伤残的朴方能离开北京的社会救济院，到江西和他们一起生活；要求能批准毛毛、飞飞到江西上大学……爸



爸爸、妈妈和王瑞林在江西，1972年冬。

爸能够为我们想到的、做到的，他都竭尽全力去做了。

爸爸曾经说过，他自己一生最痛苦的时候当然是“文化大革命”。而我想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中令他最为痛心的是朴方。爸爸在得知朴方的境遇后，多次给中央写信，要求给朴方治病。朴方到了江西，年近七旬的爸爸，天天为朴方擦身。朴方下半身没有了知觉，爸爸天天给他翻身，给他换衣服；爸爸、妈妈含着眼泪亲手给朴方刷洗屎尿片，洗被单，洗衣裳……每当想到这一幕，我总禁不住热泪长流。

我想，作为父母，他们的痛楚有多么深重！作为父母，他们的意志又是多么坚强！

1970年夏天，我们终于被批准可以去探亲了。多久没有见到爸爸、妈妈和奶奶了！我从宣化坐火车到北京，再到南昌，然后转乘汽车，长途跋涉，日夜兼程。当我第一次走进江西新建县望城岗的那个小院，看见久别了的父母、奶奶，真是又心酸，又高兴！我们总算又回到自己的家了。尽管在小院外面爸爸、妈妈是不自由的，我们的心情是非常压抑的，但在这个院子里，我们感到温暖，我们又有了依靠。不管天南海北，我们都能回到这里，兄弟姐妹们又能和爸爸、妈妈团聚在一起，我们都感到十分快乐！

那时候，爸爸、妈妈工资被停发，只给他们和奶奶一共三个人的基本生活费。爸爸惦记毛毛、飞飞两个插队的小儿女，每个月要从伙食费里抠出钱来，补贴他们的生活，还要给他们准备到江西探亲来往的火车票钱。所以，那时候爸爸、妈妈他们吃饭非常节约。他们自己在院子里开荒，买来菜籽，种上丝瓜、苦瓜、辣椒、大葱、豆角、西红柿……奶奶种菜有经验，担任指导；锄地、浇水等重活都是爸爸承担。奶奶做饭，妈妈烧火；爸爸管发面、有时候还做酒酿；有肉吃的时候常常也是爸爸切肉，他知道哪个部位的肉怎么切、怎么烧最好吃。当饭桌上摆上自己种出的新鲜蔬菜，大家吃起来真是格外香甜。

……

江西的生活给我们全家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。1984年8月22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毛毛写的一篇文章——《在江西的日子里》，深情地



爸爸、妈妈和奶奶在江西，1972年冬。



爸爸、妈妈和初生的眠眠在江西，1972年冬。

记述了爸爸在江西的生活。这是毛毛送给爸爸八十寿辰的生日礼物。爸爸很高兴，亲笔在这张报纸上作了批示，称赞毛毛写得真实。

严酷的现实教育着我们，正视现实，认识社会，认识我们的父亲，也认识自己的责任。我渐渐明白了许多。我们是爸爸、妈妈的儿女，爸爸痛苦，我们痛苦；爸爸受难，我们受难；爸爸高兴，我们大家都高兴。我们和爸爸生死相依。爸爸说他是“中国人民的儿子”，他是把自己的命运和我们国家、和我们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了。爸爸在危难面前，在痛苦面前，那么刚毅，顽强。他不屈服，不动摇，不回头；不哭泣，不抱怨，不诉苦。沉默着，却是高昂着头，承受着一切。我们敬重我们的爸爸，我们和爸爸生死与共！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，付出怎样沉重的代价，我们心甘情愿，我们无悔无怨！

林彪的自我爆炸令全党、全中国人民拍手称快！我们家的境遇也从此有了转机。

1973年，我们回到了北京。我们又有了家。

离开北京，我们兄弟姐妹四处离散，父母子女天各一方。历尽磨难，重新相聚，喜悦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。当初分手，我们家只有五个子女，三位老人。归来时，我们姐妹已是成双成对，而且还有了孙子辈——眠眠。我们家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。兄弟姊妹相继都有了工作，朴方的身体也得到进一步治疗。我知道，爸爸、妈妈的心里有多么高兴！

1974年，在毛主席、周总理的支持下，爸爸回到中央主持工作。三年多谪居江西，归来胸中已是雄兵百万。眼看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，千疮百孔，满目疮痍，令人痛心疾首。他下决心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治理国家，与“四人帮”针锋相对，大刀阔斧地全面整顿。整顿铁路，整顿军队，整顿教育，整顿经济；他抓工业，抓农业，抓文化，抓科技……人民看见了希望，国家现出了生机。

1976年是悲壮的一年。我们和全国人民一起经历了大悲大喜、大喜大悲的感情的波澜。

4月5日，全国的人民，北京的民众，为悼念周总理，奋起向“四人帮”公开斗争。震惊世界的“天安门事件”发生了。下午三点，“四人帮”



爸爸和妈妈，1974年8月22日。

派人带走了我的父亲，两个小时后，又带走了我的母亲。晚上，广场上的高音喇叭说我父亲是整个事件的“总后台”。

欲加之罪何患无辞！爸爸的心，我们全家的心都是和人民在一起的。但是，爸爸早就告诫我们，不许到天安门去，坐汽车都不要经过那里，以防“四人帮”制造事端。我们懂得斗争的复杂，斗争的需要，所以我们一个月前就都不出家门了。

“四人帮”对我爸爸恨之入骨，1975年的整顿更加激怒了他们。他们处心积虑，剥夺父亲刚刚掌握的权力。很快就正式宣布“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”。爸爸再次被打倒。

我伤心，泪如雨下，为爸爸、妈妈，为我们的这个家。毛毛说：“哭什么，越到这个时候越不能哭！”

的确，此时的我们已经不是当初的我们。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无知，我们已经懂得了应该怎样学会斗争。我们坚信，这一切总会有个结局。我们挺起腰杆，迎着狂风骤雨，为了爸爸、妈妈，为了我们的家，为了光明的未来，我们团结一致，去向“四人帮”抗争。

给爸爸收拾东西，我们偷偷在里面夹带了一副扑克牌。这副牌陪伴他度过了三个月与世隔绝的日子。没有广播，没有报纸，没有电视，扑克牌成为他孤寂中的一种寄托。

爸爸走后，有人来给我们办学习班。我们知道这个家又住不长了，就一边开会，乱说一通，一边整理东西。果然，没过几天，又有人来逼我们搬家，要求我们各自回到各自的单位去。他们想把我们分开，我们坚决不干！我们三姐妹和他们吵，三个人都哭了。我们决不分离。最后，我们胜利了！

我们全家搬到一所很小的院子里，还把原来家中的芍药、月季、玉簪花都搬去了。在新的院子里，我们种上丝瓜、苦瓜，小院里又有了生气。我们学会了生活，学会了无论处于多么痛苦的境遇之中，都能找到欢乐和情趣。实际上，只要你自己不倒，任何力量都不能把你打倒。这是我们经历了一次次劫难之后的切身体会。

当我们重新搬回到原来的家，里面已经空空荡荡。沙发搬走了，地毯撤掉了，连爸爸的台灯也没有留下。爸爸要看书，不能没有灯。我们



全家福，1974年8月22日。